

文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滕威 著

“边境”之南

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滕威 著

“边境”之南

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滕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19158-3

I. ①边… II. ①滕… III. ①拉丁美洲-文学翻译-研究-中国-1949~1999 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1949~1999 IV. ①I046
②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433 号

书 名:“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著作责任者:滕 威 著

责任编辑:黄敏劼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158-3/I·236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78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导 论

—

所谓“拉丁美洲文学”（以下简称“拉美文学”），指拉丁语系（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法语）美洲的文学。由于中国的拉美文学翻译以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以下简称“西语美洲文学”）为主，而且西语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刻，所以本书重点讨论的是西语美洲文学的汉译。^①

严格来讲，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才第一次以整体面貌进入中国文学视野。这表现在杂志上开始出现拉美文学专辑，出版了几种拉美文学丛书以及拉美文学史著作，并逐步确立了本土的拉美文学经典序列。然而，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等人也曾零星翻译介绍过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故此处还是先简述此段历史，以追本溯源。

① 从地理上讲，拉丁美洲涵盖从墨西哥到南美大陆最南端阿根廷的合恩角在内的 20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南美大陆为主体，也包括了北美（墨西哥）、中美、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美洲按地理政治分，可分为北美和南美；按语言—文化分可分为拉丁美洲和撒克逊美洲。拉丁美洲信仰天主教，讲拉丁语；北美洲信仰新教，讲英语。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新大陆”、“美洲”、“西语美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深刻铭写着殖民主义的印迹。因为这都是伴随殖民历史产生的命名，这些名字本身即构成对 1492 年之前生活在那广袤的土地上的原住民历史的遮蔽。他们曾经拥有自己的语言、信仰、历史；他们创造了相当成熟的文明。因此，“发现美洲”对原住民来说是典型的殖民话语。虽然“拉丁美洲”这一概念的产生紧密联系着美国南扩、南部美洲人日益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的历史，因此蕴含着同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抗争的意义于其中；但对于原住民来说，拉丁语从来不是他们的语言。拉美历史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因此在面对拉美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解放的历史时，我们其实应该首先带入原住民的视野，否则，我们谈论的民族“解放”与“自由”就始终是不完全的。但由于此问题过于复杂，又非本论文论述重点，因此只是在此作提示，而不作详论。

目前看到的、最早专门介绍拉美文学的文章是发表于1921年2月《小说月报》上的《巴西文学家的一本小说》，作者是茅盾。^① 目前所知、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拉美文学作品是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的名作《女王玛勃的面绸》，发表于1921年11月。^② 据周而复回忆，当时译介过的拉美作家作品还包括：

巴西小说家格拉沙·阿拉涅（Greca Aranha）的《加纳亚姆》（*Canaam*），阿根廷的剧本：西尔凡里奥·马内奥（Silverio Maneo）的《胡安·莫里哀拉》（*Juan Moriera*），路易斯·巴容·埃莱拉（Luis Bayon Herrera）的《圣多斯·凡加》（*Santos Vega*）和胡里奥·桑契斯·加尔台尔（Julio Sanchez Gardel）的《女巫之岭》（*Montaña de las Brujas*）。古巴作家洛浮伊拉的《不道德的人》（*Las Immorales*）和《将军与医生》（*General y Doctor*），智利诗人安台斯·贝育（Andrés Bello）的名诗《大家的祈求》（*Oración por Todos*）等作品。^③

在《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中，茅盾将拉美文学视作一种“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并指出拉美文学虽然同原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使用相同的文字，但却和欧洲宗主国文学绝对不同，从而强调了拉美文学的自主性。^④ 在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弱小民

① 《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号，2月10日出版。

② 发表杂志不详，引自周而复：《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交》，见《世界文学》，1960年6月。

③ 参见周而复：《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交》，《世界文学》，1960年6月；其中 André Bello 生于委内瑞拉，应该是委内瑞拉诗人，*Oración por Todos* 一般译为《为大众祈祷》。

④ 茅盾说：“南美的独立国家如阿根廷他都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但是阿根廷文学家摩纳河（Maneco, S.）、赫娄拉（Harera, L. B.）、茹特尔（Cardel, J. S.）等人的作品和白桑（Bazán, E. P.）、伊本纳兹（Ibáñez, V. B.）、柴玛苏滑（Zamacois, E. Aranha, G.）等人的作品决不能一样，虽然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又如巴西他都是用葡萄牙文字的，但巴西小说家阿拉涅（Aranha, G.）、纳都（Netto, C.）、班以克萨都（Peixeto, A.）、特阿惠斯（De Assis, M.）等人的作品和特阔亥洛支（De Queiroz, T.）、列玛（Lima, S. M.）、达尔曼提亚（d'Almeida, F.）、达卡玛拉（Da Camara, D. J.）等人的作品决不能一样；这很可证明民族文学的特点，不在文字的不同了。”见茅盾：《“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0号。

族专号”中,^①编者认为“拉丁亚美利加民族虽久已脱离欧洲的宗主国,而成为独立共和国,但政治经济都不能独立,受英美帝国主义宰制”,所以拉美各族属于小国民族。因此这一专号中介绍了包括秘鲁、巴西、阿根廷在内的“弱小民族”的文学状况和作品。而且鉴于“近年拉丁美洲诸国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也颇有蓬勃之势”,编者特意编选了三篇反映此种现实的拉美小说。^②上述观点表明,译介者既不是被拉美文学辉煌灿烂的成就所吸引,也不是想从中吸收能够影响中国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而是将那些文学作品作为拉美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呈现引入。^③译介者更希望读者关注的不是故事情节、叙事技巧、语言风格,而是作品中所展现的反殖民反压迫的斗争以及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那些文学作品不仅唤起他们对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他们将对本民族的自我想象投射其中。同样拥有古老的文明、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但却同样遭受侵略与掠夺,于是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同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某种镜像关系。可以说,彼时拉美文学虽然开始为本土所接收,但它并未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源,而仅仅是某种相似又相异的参照。这一点深刻影响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拉美文学的选择、翻译和接受。

二

“拉美(文学)”与“当代中国”这一论题自身蕴含的丰富的问题性为我们敞开了广阔的研讨空间。作为“亚非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美文学无疑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但它更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中国第一次规模性地翻译拉美文学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驱动的,而且西班牙语这一专业起初就是因国家政治需要而开设的。

① 郑振铎、傅东华主编《文学》,第二卷第五号弱小民族专号,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② 即秘鲁 Lopez Albujar 的小说《催命太岁》(余声译),巴西 Alfonso Arinos 的小说《脚爪的野兽》(胡仲持译)以及阿根廷 Leopoldo Lugones 的小说《惩罚》(伍蠡甫译)。

③ 当时还有一些文学杂志也偶尔提到过拉美文学,比如《前锋月刊》发表过汪恂然的《南美小说家之新作》(1930年10月10日),《现代文学评论》发表过杨昌溪的《阿根廷的近代文学》(第二卷第四期)。多是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而且没有翻译文学作品。他们介绍拉美文学,更多是为了提供一种异域的文学景观,从而显示杂志追踪、捕捉世界各国文学动态的能力,比如《现代文学评论》经常一期刊登多国的文坛动态以招徕读者。

因此，拉美文学翻译在 50—70 年代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翻译与政治之间复杂的连接与互动。80 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曾经具有的政治所指逐渐消隐。在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清算之后，曾经在 50—70 年代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不仅成功抹去历史印记继续被大量译介，而且在一个以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大叙事和奋斗目标的时代里，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①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进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 80 年代文学的变革。80 年代“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现代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 80 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催生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两个 80 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进入 90 年代，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似乎本该归属的社会边缘位置。由于中国的日益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制约，日渐委顿。然而此间，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却在中国一枝独秀，不仅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尚，受到文化市场追捧。90 年代的“博尔赫斯热”与“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及“书写文化英雄”等重要文化现象息息相关。

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有趣的同构关系。因此，笔者选择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历史，不仅是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描述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同时

① 必须指出的是，大语种/小语种这种关于外语的等级序列是在权力关系之中被建构出来的。就西班牙语而言，它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三大语种之一（另两种是汉语和英语），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因此在国际社会中，西班牙语并非小语种。之所以在美国西班牙语是最重要的外语之一，而在今日中国则是小语种，这同中美两国与讲西班牙语地区（主要是拉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密切程度直接相关。同时，这种等级序列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在 50—70 年代的中国，出于参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都是重要的外语，即所谓“大语种”，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日语、德语的重要性开始日渐突显，逐渐取代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成为中国的“大语种”。因此本文使用加引号的“小语种”，以表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文中还会多次论及。

关注中国拉美文学翻译历史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三

从研究方法上讲，本书是试图在文化研究视野中展开的“翻译研究”。^① 因此研究与写作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两大领域。因为“翻译研究”理论在中国尚未像文化研究理论一样被广泛关注，所以这里有必要简要描绘一下“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

此处的“翻译研究”，并不是泛指对翻译的研究，而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科化的“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② 传统翻译研究始终建立在对“原文”、“译文”的本质化定义之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e）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因此那些关于翻译的讨论经常是经验主义的，总在探究如何使译文与原文等值。而“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再围绕“翻译如何更忠实于原著”做绝望的探寻，而是转向以译文为中心，讨论翻译文学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这直接受到来自语言学转型之后的欧陆理论的影响。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什么是原文，这首先是应该被质疑的问题。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提示要将作者视为一系列的主体位置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个体，因此作者并不拥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只是履行话语赋予它的功能。换句话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重要在于话语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则彻底消解了作者对于文本的绝对所有权。如果文本自身没有意义，它的

① 文中凡是提到 *Translation Studies* 用加引号的“翻译研究”以便同传统对翻译的研究区别开来。

② “翻译研究”，指1976年在比利时鲁文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翻译”研讨会上新成立的一个专门学科。其创始人之一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于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称及性质》，被追认为该学科的奠基文字。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1976年的会上发表了《翻译研究：学科的目标》的宣言，他被视为“翻译研究”真正的创始人。

意义都是阅读中重构出来的，那么“原文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如果原文的权威性变得可疑的话，那么传统翻译研究关于原文与译文关系的界定，即认为译文次之于原文，只能是原文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复制的观点便会呈现出丛生的裂隙。^① 解构主义借用本雅明的“来生”（*fortleben*）概念^②，提出原文依赖翻译而生，没有翻译，就没有原文；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写。雅克·德里达说，翻译产生于原文的内在法则，原文的结构中存在着被翻译的要求和欲望——对本雅明所说的“生存”的渴望^③，因此原文一开始就呈现匮乏，就请求翻译，负债于翻译。^④ 这些思想将翻译从原文的阴影中逐步拯救出来，而“翻译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开始成为生产批判思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

早期“翻译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 DTS）^⑤ 的个案分析，而其理论贡献则来自伊特玛·埃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① 解构主义者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中世纪的译者并没有原文高人一等的观念；那是启蒙主义的产物。参见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e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6;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原版影印本，2001 年，第 123 页。

②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译文标志着作品生命的延续，它是原著的来生。本雅明“来生”概念的意义在于，他赋予了翻译独立于原著的价值。他说“如果翻译的本质在于求得和原著相似，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原著在翻译中发生了质变，否则不能称之为来生。翻译经历了原著语言的更新和自身语言的降生。因此本雅明说，正是翻译点燃了作品永恒生命和语言无休止更新的火焰。参见孙冰编：《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年，第 115—135 页。

③ 德里达不把本雅明的这个德文概念“*fortleben*”翻译为死后的生命（来生），而翻译为“生存”。他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德里达：《巴别塔》，收入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④ 德里达：《巴别塔》，见《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⑤ 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分工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中纯翻译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叫做描述翻译研究。在霍姆斯之后的 20 年中，DTS 是“翻译研究”中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以色列学者吉登·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5）一书系统阐明了 DTS 的方法论。

Theory)^①。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多元系统理论显得有些“粗陋”,^②但它将翻译视为目标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塑力量,这为“翻译研究”打开了许多面向。正是在它的启迪下,“翻译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的建构作用。“多元系统理论”使“翻译研究”开始将更广泛的历史语境纳入视野。既然本土文化的改变越来越依赖翻译,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越来越通过翻译来建构,了解翻译的过程如何进行以及哪种翻译被生产出来也就越来越重要。为什么是这些文本被翻译了而不是其他的?翻译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翻译技巧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某种特定动机的?在这些动机的控制之下译者是如何被利用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得翻译过程中原来被遮蔽或被视作透明的因素——现身,比如译者、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市场……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③“翻译中的每一步骤——从外国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对译本的编辑、评论以及阅读——都是由目标语言中流通的不同文化价值造成的,而且总是处于阶级的秩序之中。”^④因此,无论是在源文化还是目标文化中,翻译总是陷入权力关系网中。于是,“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这就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呼唤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⑤

①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翻译在其中占的位置可以是主要的,也可以是次要的,这要看当时的文化语境。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占主要位置,即积极参与建构多系统的中心;这三种情形是:1. 当这个多系统尚未完成,即该文学处于“年轻”或正在建立中;2. 该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3. 该文学正处于“危机”或转折阶段。参见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7月,第19—25页;以及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2004年,第106—145页。

②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p. 126.

③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2004年,第1—13页。

④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⑤ André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0.

而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事实上特指转向文化研究。巴斯内特曾经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对比，指出它们都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路线，但却一直是平行发展，从不发生关联。^①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它们的相遇却含有某种必然性。毕竟，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翻译”的世界里。^②雪莱·西蒙说，文化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mediation），它不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于其中。^③因此“翻译研究”必须关注传介过程本身。比如，为什么需要在本土文化中通过翻译再现一个外国文本？谁翻译、为什么翻译、有什么目的？谁来决定什么文本能代表异国文化并将被翻译？决定译者采用什么翻译策略的原则是什么？……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呼吁“翻译研究”转向文化时，明确提出所谓“转向文化”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④勒菲弗尔还就此创设出一套

① 巴斯内特参考了安东尼·伊索普（Anthony Easthope）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But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之后提出，“翻译研究”也经历了伊索普所勾勒的文化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文化主义（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理查·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E. P. 汤普森 [E. P. Thompson]），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而“翻译研究”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文化主义——奈达（Eugene Nida）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结构主义——埃文-佐哈尔和图里；后结构主义——雪莱·西蒙（Sherry Simon）和尼兰加纳（Niranjana）。巴斯内特主张“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靠拢，显然包含着试图改变“翻译研究”在学院体系内部边缘的地位、捍卫学科自身利益的意思于其中。（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早在1990年，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号召“翻译研究”转向文化时，同时提出重新划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界限，认为不考虑翻译，就没有比较文学的研究；他们甚至认为应该把比较文学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而不是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André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从这些主张中都可以看出两位“翻译研究”的先驱如何不断在各种学科的疆界中划定“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和领域。

②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6, p. 134.

③ 参见雪莱·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吴晓黎译，陈顺馨校，收入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④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p. 123.

“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①, 研究意识形态、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文化体系(universe of discourse)、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central text and central cultures)等七个方面的因素如何参与操控翻译过程, 并制约翻译文本的生产。^②

勒菲弗尔在此突显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 他和巴斯内特等操控学派的学者将翻译文本作为编码、解码的批评实践的场所, 试图从中发现权力的隐蔽结构。其实, 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中, 可以发现它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联。对阿尔都塞来说, “没有不利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不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的实践”, 无论写作还是翻译都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实践方式。但是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一样, 操控学派虽然在揭露翻译中的权力结构方面极富阐释力和颠覆力, 但它将权力视作本质化的存在, 似乎译者只能被动地为其意识形态所利用, 而完全丧失主体性。同时, 它将操控翻译的权力仅仅归结为皇权、政府、宗教等特权阶层所有, 而忽视了种种合谋关系的存在。为了从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范式导致的僵化中拯救自己, 文化研究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戴锦华曾经指出, 葛兰西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他指出社会中存在着文化霸权(hegemony)结构, 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借助这种结构才得以维护统治; 也不仅在于他揭示了一个阿尔都塞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已经揭示过的事实: 赤裸裸的暴力的国家机器是很难真正进行统治的, 必须配合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它才能够运行; 而在于他指明文化霸权结构要想成为霸权就必须吸收并内在地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于其中, 即必须包含那些它试图放逐的文化, 否则它将不能成功地统治。^③ 转向葛兰西之后的文化研究将文化视作协商和斗争之所, 这意味着与权力的共谋

① 勒菲弗尔的《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翻译研究中比较早对翻译中的权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 1985年赫曼斯(Theo Hermans)编辑出版了《对文学的操控: 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 集中了同勒菲弗尔一样关注翻译中的权力问题的学者(包括巴斯内特在内)的研究, 他们因此被称为“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

②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pp. 1-13.

③ 戴锦华:《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2002年冬季文化研究集中课程讲义”(未出版资料)。

及对权力的抵抗可能同时存在。因此在每一个可能的文化领域中，被统治阶级文化随时可以展开与统治阶级文化抗衡的“文化游击战”，也随时可能被后者收编。从权力到霸权的认识转变，反抗的现实可能性和力量被释放出来，人的主体性得以恢复。

但是在翻译领域中，强调翻译必须与原文对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译者是不可见也不能现身的。果戈理曾经谈到，“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译者隐身得越成功，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就越高。如果从译文中完全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翻译就会像科学一样值得“信任”。较早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是法国学者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贝尔曼认为，译者绝不是一个消极地接受文化规则而复制出来的中转站，译者的主体性必须被理解为传介活动的复杂过程的一部分。^① 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② 中为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在他看来，译者主导着翻译的过程，决定着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翻译。而透明仅仅是翻译策略——归化——中的一种。对很多女性知识分子而言，不可缺少的斗争面向是如何在翻译中放置女性主义的立场，从而反抗男权文化的暴力。既是理论家又亲身参与翻译实践的斯皮瓦克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任务是把语言看作揭示性别化能动机制之运作的线索；因此使自己处于译者的位置，使自己成为中介的主体，这样才能在翻译中实践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③ 同时，作为来自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的规划中不仅包括女性主义的视野，还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的思考。也就是说，种族/阶级/性别三个向度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正是在这个时刻，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相遇——“翻译研究”日益借重文化研究的思考，而翻译也成为文化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领域。

① 参见雪莱·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收入《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350—353页。

②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③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许兆麟、郝田虎译，刘健芝校，收入《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277—308页。

四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进行“翻译研究”，这首先意味着，笔者在考察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历史时，关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构造作用，但却并不将某一时段——比如 50—70 年的拉美文学翻译仅仅看作国家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因为翻译的历史中充满协商与斗争。其次，本书将翻译视为再现与建构文化认同/身份（identity）的场域，并在此展开民族国家想象自我与他者的问题系。韦努蒂的《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给本书写作以很大启示。^①他指出，翻译项目不仅建构着独特的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现，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而且因为这些项目针对的是特定的文化群体，它们同时也就参与建构了本土主体。对异域文本和翻译策略的精心选择可以改变或者强化本土文化里的文学典律、概念范式、研究方法分析技能和商业践行。受韦努蒂的启发，本研究将特别关注当代中国在怎样的语境下引入拉美文学，翻译如何在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外语教育、出版机制、文化市场的“赞助”下建构了拉美文学的本土经典序列，如何通过翻译文学再现并固定了拉美的形象，翻译如何影响到本土对拉美文学的接受，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又耦合（articulation）^②了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再次，笔者同样关注译本之间的差异、译者的翻译观念与实践，但不仅是为了建立一种价值评判体系，而是为了将它们问题化，

① 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查见贤译，刘健芝校，收入《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 358—382 页。

② 耦合在文化研究中不再带有最为人熟知的“发音清晰”之意，其用法引申自 articulated lorry “铰接式卡车”，因此常被译为“咬合”、“接合”、“耦合”等，意为将两样东西合为一体。在文化研究中，被咬合的不是一个卡车的两个部分，而是大规模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生产方式），它们以某种特殊的构造或形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即所谓时机被耦合在一起，从而为任何特定的实践、文本或事件提供结构性的决定因素。但耦合并不是单纯的力量合并，而是力量间的等级关系，这一术语是以斯图尔特·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关键概念。用霍尔自己的语言表述，即“一种接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接合成或没有接合成某一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自己的思想。详见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16—17 页；以及斯图尔特·霍尔：《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尔特·霍尔访谈》，周凡译，收入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196 页。

将它们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从而再现霸权建立过程中斗争与妥协的痕迹。除了翻译文本之外，重要的翻译批评，关于拉美的文学史书写、文学评论、论争，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其他拉美著作以及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等相关文本都将被纳入考察视野。因为只有同众多的相关文本的互文关系中，我们才可能相对“还原”出拉美文学翻译生产的历史语境。最后，在文化研究语境中展开“翻译研究”，并非意味着仅仅将翻译活动视为文化生产、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对于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早期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等对于人类情感结构的重视。尽管处理情感结构使文化研究常常面临困境——正如戴锦华所说，情感结构在文本中是被压抑的，但我们却只能从文本之中去发现情感结构，因此我们如何能依据文本去再现情感结构并从再现中发现历史的暴力，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仅仅将拉美文学汉译理解为受体制制约的生产行为，至少化简了其历史过程原本蕴含的多种面向和多个层次。因此，尽管论述过程中，作者注意揭示各种制度性因素对翻译活动的规约，但也努力发掘翻译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译者的主体性、情感、挣扎等等这些并不能完全被纳入体制中考察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文化霸权建立中宰制与抵抗的斗争过程。而在我看来，对本书的写作来说，再现这一过程比给出某种盖棺定论的解释更加重要。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50—70 年代：被建构的拉美/革命文学	1
第一章 拉美文学汉译的政治动力学	4
第一节 文学翻译：“民间”外交的一种形式	4
第二节 古巴革命与翻译高潮	9
第三节 中苏分歧与翻译禁区	18
第四节 “文革”中翻译的停滞	23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拉美文学翻译	26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机构化	27
第二节 本土文学规范对文学翻译的规约	29
第三节 革命文学的另一风貌	34
小 结	41
第二部分 80 年代：本土现代化想象中的拉美文学	42
第一章 80 年代拉美文学热	47
第一节 拉美文学汉译高潮	47
第二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流行	50
第二章 拉美“文学爆炸”神话的本土重构	56
第一节 对 <i>Boom</i> 的翻译	56
第二节 误读与改写	60

第三章 魔幻现实主义：从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逐译	71
第一节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	71
第二节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	78
第三节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纯文学化”	83
小 结	92
第三部分 90 年代：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拉美文学翻译	93
第一章 文化市场化中的拉美文学翻译	95
第一节 市场化的种种影响	95
第二节 慢热的博尔赫斯	103
第二章 博尔赫斯：圣人·大师·文化时尚	106
第一节 80 年代对博尔赫斯的翻译与接受	106
第二节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12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命名博尔赫斯	123
小 结	137
结 语	138
参考文献	148
附录一 中国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目录（1949—1999）	158
附录二 拉美文学翻译出版数据统计表（1949—1999）	180
后 记	182